

教聯筆陣

陳培珊 | 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

重視體育課
推動全人發展

粵港澳成功合辦的十五運會，標誌着區域體育協作進入新階段，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向前推進的嶄新起點。這場盛會不僅呈現了高水平的競技比拼，更搭建了一個資源互通、經驗共享的平台，為香港學校的體育發展帶來重要思考。綜觀本屆盛會，其影響力顯然超越了競賽本身。它折射出一種資源共享、優勢互補的新型合作形態——硬件設施聯通、專業人才互通、產業要素融通，正共同構建一個充滿活力的區域性體育生態系統。置身於此網絡，香港的學校體育不應繼續停留在教育工程的邊緣位置，而亟需啟動一次從認知到方法的全面升級。

當前，香港學校體育課面臨一些深層挑戰。在偏重學術成績的整體氛圍中，體育課時常被壓縮，其功能被簡單理解為「課間放鬆」。課程設計缺乏長遠規劃與進階邏輯；運動空間受限的問題在稠密的都市環境中尤為突出；體育教師的職業發展與支持體系亦有待提升。更重要的是，體育的多元教育價值，如品格塑造、情緒管理、團隊凝聚力培養等，尚未得到足夠重視。這種相對局限的視角，可能讓本地體育人才的發掘與培養出現缺口，也令學生錯失了通過體育運動達成全面成長的重要途徑。

培養鍛煉習慣兼顧選拔體育精英

十五運會的組織與舉辦，恰好為香港學校體育課的改進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框架。首先，構建連貫的課程體系至關重要。應當超越目前課時分散的現狀，設計一套覆蓋基礎教育與特長培養的漸進式方案。小學階段可聚焦於運動興趣啟蒙與基礎體能發展；中學階段逐步引入選修項目，並與社區體育組織建立銜接；高中階段則為展現出特殊潛質的學生提供更專業的訓練指導。這種「全面覆蓋」與「重點培養」相結合的結構，有助於實現普及運動與精英培育的雙重目標。

其次，探索靈活的「體教結合」機制。可以參考多方經驗，促進學校與專業體育機構建立穩定的協作關係。在保障學生正常完成學業的基礎上，提供系統化的運動訓練支持，並通過學分制、在線學習等彈性安排，有效平衡學術要求與訓練周期，真正體現對學生運動員雙重身份的尊重與支持。

再者，主動融入區域協作網絡。香港學校可

積極與灣區其他城市的院校及機構建立常態化交流，共同開展聯合訓練、舉辦友誼賽事、共享專家與設施資源。這類跨城互動不僅能提升運動技能，更有助於拓寬學生視野，增進他們對大灣區共同家園的了解和認同。

此外，營造深厚的校園體育氛圍是根基。學校應將運動精神有機融入日常校園生活，通過舉辦多元體育競賽、邀請優秀運動員進校園、表彰體育成就等方式，使崇尚健康、尊重拼搏、注重團隊的價值取向成為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尤其需要指出的是，體育教育是涵養家國情懷的有效途徑。體育運動中所強調的紀律性、集體榮譽感和頑強拼搏精神，與愛國主義教育的內涵天然契合。學校可通過組織觀看升國旗儀式、講述國家運動員為國爭光的故事、探討體育發展與國家強盛的關係，引導青少年在體育活動中深刻理解個人與集體、香港與國家之間血脈相連的關係。在團隊訓練與比賽中，學生能切身感受到協作的力量和為共同目標奮鬥的使命感，從而將愛國情感內化為自身的價值追求。這種寓教於體的方式，生動而深刻，是培養青少年國家認同和社會責任感的重要契機。

藉體育課實踐「全人教育」

現代體育的意義早已超越身體活動的範疇。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備受關注的當下，體育活動是舒緩壓力、培養積極心態的有效手段；在未來社會更看重軟技能背景下，運動場更是磨練溝通、協作、抗挫折能力和領導力的課堂。推動學校體育的發展，本質上是對「全人教育」理念的回歸與實踐。

十五運會如同一扇窗口，既讓我們看到現狀中的提升空間，也展現了區域融合帶來的廣闊前景。面對新的機遇，香港教育界需要以更創新的思維和更長遠的布局，重新審視體育在教育體系中的戰略價值。

讓我們把握這個歷史契機，讓體育從校園教育的側翼走向中央，不僅有助於學生在學術上精進，更能幫助他們在運動中鍛造強健的體魄、堅韌的意志和深厚的集體意識，香港的青年一代才能以更全面的素養和更自信的姿態，主動融入並服務國家發展大局，在粵港澳大灣區乃至世界舞台上，開創屬於自己的精彩未來。

美軍工複合體 操縱「中國威脅論」牟暴利

林志成 | 香港正思研究院資深研究員

近日，美國宣布對中國台灣地區出售價值約110億美元的軍品計劃。這是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，美國第二度宣布對台軍售，也是美方歷來對台規模最大的武器銷售計劃。

1961年，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其告別演說中，向國民發出了一個日後被反覆引證的嚴厲警告：警惕「軍工複合體」（Military-Industrial Complex）對美國政治與民意的「不當影響」。這位五星上將出身的總統敏銳地洞察到，一個由龐大的軍事機構、軍火工業和部分政客構成的利益共同體已經形成，它有能力為了自身的生存與擴張，綁架國家的外交與安全政策。

塑造假想敵發「戰爭財」

六十多年後的今天，當我們審視華盛頓甚囂塵上的「中國威脅論」時，便會發現艾森豪威爾的警告不僅沒有過時，反而具有了令人必須直視的現實意義。所謂「中國威脅」，在很大程度上並非美國國家利益的客觀反映，而是這個軍工複合體為了自身利益，精心策劃、系統建構並強力推銷的一套敘事產品。理解「中國威脅論」的甚囂塵上，必須深入其背後的政治經濟學邏輯，看清究竟是誰在從塑造「威脅認知」的過程中牟取暴利。

軍工複合體的核心，是洛克希德、馬丁、雷神、諾斯羅普、格魯曼等軍火巨頭。它們的商業模式天然具有「親衝突」的基因：和平與緩和意味着訂單的減少和利潤的下滑，而緊張、對抗乃至戰爭，則是它們財源滾滾的保證。冷戰的結束曾讓它們一度陷入「敵人缺失」的恐慌，隨後的「反恐戰爭」雖然提供了新的財源，但其規模和對手的量級，遠不足以支撐其對天量國防預算的渴求。因此，尋找一個新的、體量足夠龐大、技術水平足夠先進的「長期戰略競爭對手」，成為它們維持高額利潤的必然選擇。放眼全球，只有快速發展的中國，才能完美地扮演這個為美國軍費突破萬億美元大關提供正當性的「完美敵人」。

如果說軍火商是引擎，那麼華盛頓的各大智庫就是為這台引擎提供「理論燃料」的「大腦」。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（CSIS）、蘭德公司、哈德遜研究所等機構，源源不斷地生產着各類報告、文章和兵棋推演，從技術、戰略、意識形態等各個角度，論證「中國威脅」的嚴重性與緊迫性。然而，這些看似客觀中立的學術研究背後，是清晰可見的利益鏈條。根據公開資料，這些智庫大多接受來自軍工巨頭的巨額資助。這種「金主」與「學者」的關係，決定了其研究議程和結論必然會服務於資助者的利益。它們並非在進行獨

立的學術探索，而是在為軍工複合體的產品進行「需求創造」和「市場預熱」，用學術的語言包裝赤裸裸的商業訴求。

官員游說軍火商供政治獻金

有了商業引擎和理論大腦，還需要將這一切轉化為實際政策的「傳動系統」，這便是由國會議員、政府官員和游說集團構成的政治網絡。在華盛頓，「旋轉門」現象早已是常態：五角大樓的高官、國會議員及其助理，在卸任後無縫切換身份，成為軍火公司的高管或說客，利用其在政府內的人脈和影響力為老東家爭取訂單。根據統計，僅在2023年，美國國防工業的游說支出就高達1.4億美元，僱用了超過700名說客，其中近三分之二都是前政府官員。這些說客穿梭於國會山和五角大樓，用政治獻金敲開大門，用就業崗位（軍工廠通常設在關鍵搖擺州的選區）綁定議員的政治前途，確保任何削減軍費的提議都胎死腹中。

於是，一個自我循環、自我強化的利益閉環就此形成：軍火商出錢資助智庫，智庫製造「中國威脅」的學術依據；軍火商用金錢和選票影響議員，議員在國會推動增加國防預算；五角大樓獲得更多預算後，向軍火商採購更多武器；而為了證明這些武器的必要性，整個系統又需要進一步渲染「中國威脅」的嚴重性。在這個閉環中，中國的實際意圖和行為已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「中國威脅」這個概念本身所能帶來的巨大政治和經濟利益。

這種基於內部利益驅動的「威脅塑造」，最終必然導向一種危險的「自我實現的預言」。美國基於這套敘事，在中國周邊加強軍事部署、拉攏盟友構建圍堵圈、研發針對性極強的作戰系統。面對這種步步緊迫的態勢，中國必然會做出相應的反應，加強國防現代化建設以捍衛自身主權與安全。而中國的這種正當防衛之舉，又會被軍工複合體及其喉舌解讀為「侵略性」的證據，從而開啟新一輪的軍備競賽螺旋。這套機制的危險之處在於，它並非為了解決問題，而是為了延續問題，因為它本身就是靠問題而活。

中國的應對，不應是陷入對方設定的「威脅—反應」的邏輯陷阱，並與之進行亦步亦趨的軍備競賽，而應保持戰略定力，一方面堅決回擊不實指責，向世界揭示「中國威脅論」背後的利益驅動；另一方面，更要集中力量發展自身，以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和國防現代化的穩步推進，作為應對外部風雲變幻最堅實的壓艙石。當中國足夠強大、足夠清醒時，任何被製造出來的「威脅敘事」，都將不攻自破。

灣區瞻勢

芷江受降警醒未來
銘記歷史堅韌自強

詹培勳 | 中國僑聯青委



筆者近日到訪湖南芷江。說來慚愧，這個名字過去並未真正進入筆者關注視野，但正是在這個並不起眼的小城，中國迎來了抗日戰爭的最後一幕——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大陸正式簽署投降書。歷史在此定格，中國人在經歷八年浴血抗戰後，第一次以勝利者的姿態，抬起了頭。

芷江受降，並非一場簡單的儀式，而是一場極其莊嚴、嚴謹、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歷史時刻。1945年8月，日本陸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在此代表日方簽署投降文件。這不是海外戰區的間接安排，而是在中國土地上、由中國軍隊主導的受降。這一刻，既是抗戰的終章，也是民族尊嚴的復歸。

行走在芷江抗日勝利受降紀念館內，歷史並不喧嘩，卻令人久久不能平靜。斑駁的史料、嚴整的受降流程復原、細緻的文獻記錄，都在提醒後來者：這場勝利從來不是輕而易舉。中國付出了超過三千五百萬軍民傷亡的巨大代價，才換來這一紙投降書。

芷江的意義，還不僅於此。這裏曾是中國重要的航空樞紐之一，也是飛虎隊活動的重要區域。在中國空軍處於絕對劣勢的年代，美軍飛虎隊協助中國建立空中防線，參與機場建設、飛行訓練和作戰支持，為中國空軍爭取了寶貴的生存與成長空間。芷江空軍學院的存在，正是中國從被動挨打到逐步具備空中反制能力的歷史見證。

這種從極端劣勢中奮起的歷程，今天看來尤為值得珍視。今年是中國人民抗

在AI技術尚未普及的十年前，這種依賴機器視覺識別的方法尚算可行。然而，隨着生成式AI（Generative AI）技術逐漸成熟，深偽（Deepfake）技術已經發展到出神入化的境界。

以這次詐騙積金易平台案件為例，警方指出詐騙集團使用的是「高仿身份證」。在今天，不法分子利用生成式AI技術，不僅能合成出像真度極高的假身份證圖像，甚至能模擬防偽特徵，達到騙倒傳統eKYC系統「機器視覺分析」的程度。當銀行和金融平台無法驗證到「實體證件」，又無法連接官方數據庫核實時，單靠分析一張經手機拍攝的照片，用「傳統機器視覺」應付「生成式AI深偽」，便顯得脆弱無力。這正是積金易平台被攻破的根本原因。

防範有人用深偽技術進行詐騙

針對是次漏洞，有科技專家建議轉用「智方便」（iAM Smart）進行認證。筆者表示認同，這是現在最就緒的「止血」方案。「智方便」作為目前唯一能直接聯繫入境處系統的數碼身份認證工具，背後連接的正是非常重要的「權威來源」。透過「智方便」，金融機構可以確保開戶者經過政府核實的真實身份，抵擋深偽身份證的攻擊。

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不應只有一個應用程式支持整個金融系統的身份認證。有關政府部門應審視現時運作，在保障私隱及數據安全的前提下，參考內地NCIIS或新加坡的模式，開放身份證核實服務的應用程式界面（API），容許持牌銀行和受監管金融機構（包括積金易平台），在獲得用戶授權後，直接發送身份驗證請求到入境處系統，核實申請人資料。例如，機構上傳身份證號碼、姓名、照片等資料，入境處系統只需回覆「是/否」或「匹配度」，過程無需回傳敏感的個人訊息。

積金易平台詐騙案已經為香港敲響了警鐘。今天生成式AI技術快速迭代，僅依賴「機器視覺分析」，即使加上「人眼覆檢」驗證身份證件的方法已經不足。電子身份認證eKYC是數字經濟的基石，也是金融基建非常核心的一部分。唯有打通政府數據庫與金融體系之間的壁壘，實現真正的「源頭核證」，才能從根本上堵塞漏洞，保障金融安全，守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以至智慧城市的長遠發展。